

# 新英雄史觀和中國大轉型

## ——改革開放的回顧和反思

嚴家祺

### 一 舊英雄史觀和新英雄史觀

中國正處在大變革、大轉型的時代，這是一個創造歷史的時代。歷史不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人民群眾是歷史的推動者，而不是創造者。人類史上絕大多數歷史事件是自然發生的，而不是人有意識地創造，只有政治、技術、藝術和科學假說可以由人有意識地創造。這裏談「創造歷史」，是指創造國家的歷史、世界的歷史。國家的歷史，是一個國家大多數人的共同記憶；世界的歷史，是全人類的共同記憶。創造歷史需要特定的思想、廣闊的眼界、洞察力、決心、毅力、謀略、號召力等等，它是許多「思想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綜合。演化生物學家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用「心因」(Memes) 一詞來代表這些因素<sup>①</sup>。「心因」是生物學上「基因」的文化類比。「基因」通過遺傳而在生物界中傳播，「心因」是人腦特有的，從一個人的頭腦跳到另一個人的頭腦中，在人類社會中傳播。特定「種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組合。

創造歷史——與發明新技術、新產品、新武器、新方法一樣，都是從少數英雄的「種子」萌發出來的，要經過試驗到大規模工業生產各個階段，新制度、新體制、新局面、新社會才能創造出來，這就是新英雄史觀——「創造史觀」。

基督徒都熟知神學家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的《寧靜禱文》(Serenity Prayer) 格言：「神啊，給我以寧靜之心，去接受那些我不能改變的事物，給我以勇氣，去改變那些我能夠改變的事物，給我以智慧，去區分兩者之間的不同。」事實上，這段話來源於舊英雄史觀的代表人物卡萊爾 (Thomas Carlyle)。卡萊爾認為，人沒有能力去阻止已經發生的事情，但卻有能力去改變已經發生的事情對我們現在生活的影響。卡萊爾的人生態度是，接受已經發生的，改變可以改變的。他在《英雄與英雄崇拜》(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一書中說，歷史是英雄創造的，「整個世界歷史的精神，很公正地說，就是這些偉人的歷史」<sup>②</sup>。他崇拜英雄變革的力量，特別崇拜一種與上帝所賦予的使命相結合的力量。他把英雄視為具有超出常人精神特質的先知或神人。

新英雄史觀與舊英雄史觀不同在於，創造歷史需要「思想種子」，「種子」來源於想像力和規範世界<sup>③</sup>，而想像力來源於思想自由。種子有「好種子」、「壞種子」、一般種子，還有奇怪的種子——「奇異子」，甚麼種子結甚麼「果」，胡思亂想不會產生「種子」。新技術的發明者頭腦中的思想，就是新技術的「種子」；歷史創造者有關變革現狀的、可行的思想，就是創造歷史的「種子」。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是「好種子」；袁世凱只想復辟帝制，逆潮流而行，是一顆「壞種子」；哥倫布和鄭和都是「奇異子」，一個發現新大陸，另一個在哥倫布之前就開闢了那個時代的「一帶一路」。

一切成為政治史、技術史、藝術史、科學史的事件，特別是成為國家史和世界史的重大歷史事件，離不開個人的思想、毅力和謀略。從我們平常尺度的時間來看，在五年、十年或稍長的時間內，掌握巨大權力的個人，可以預測歷史變化的趨勢，或者順應歷史變化，創造歷史。我們可以離開許許多多具體的人去分析、研究經濟史、社會生活史，但一個國家和世界政治史，離不開具體的人的參與。創造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種子」，是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不是人民群眾，而是英雄、梟雄、首腦人物、戰爭、革命和無數偶發事件，創造了二十世紀中國史。

## 二 歷史轉型中的「不同步」問題

人們容易區分經濟和政治，但往往不易或不願區分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社會制度是在長期中自然形成的，其中經濟制度是社會制度的最重要內容。國家制度是關於國家結構、政體、政府規模和權力行使範圍的制度，其中政治制度是國家制度的最主要內容。國家結構形式，有聯邦制、邦聯制、中央集權制、地方分權制，「一國兩制」也是其中一種。國家政治制度與社會經濟制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國家政治制度，有專制和民主制度之分；從國家政體來劃分，有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共和政體。在共和政體下，還可以區別為總統制、議會制、半總統制、委員制等不同形式；軍事獨裁、「一黨專政」是專制制度的不同形式。農奴制、封建莊園制、資本主義和公有制主導的社會主義，是不同形式的社會經濟制度。對不同國家和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國家制度與社會制度可以形成迥異的組合，在歷史上，一些國家的社會制度發生了巨大變化，而政治制度卻沒有改變，在文藝復興後西歐的一些國家，這種情況表現得很明顯。最近四十年，這種情況在中國發生了。

四十多年前，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實行的是一種按照馬克思主義設計的方案而建立的社會制度——生產資料公有制加上計劃經濟。文化大革命中，連私人在住宅邊上狹小的地段種植一些農作物都被禁止，當時稱這種做法為「割資本主義尾巴」。毛澤東時期的社會制度與今天中國的社會制度，都稱為「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是有根本區別的。鄧小平時期以來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是社會制度的變化。今天仍然把中國的社會制度稱為「社會主義」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掩飾了這一重大變化。與歷史上歐洲許多國家的變化一樣，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變革，或早或後會引起政治制度的變化。

經濟發展總是伴隨着經濟制度和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而政治制度的變化可以是與經濟相適應，也可以是由於掌握國家大權的人按他的意志，依靠強力改變原有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這種改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或者有力地推動經濟發展，或者嚴重地阻礙經濟發展。倒行逆施的政治，或者獨斷專行的劇烈變革，會給人民和整個國家帶來災難。在這種情況下，憑藉個人意志的變革將遭到失敗。但在廣義上說，這也是創造歷史。

對一個國家來說，歷史的大轉型，就是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的大變革，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的轉變不是同步的，社會制度的轉變是一種自然過程，需要經過長期的醞釀，而國家制度的變革可以在相對短的時期內完成。

馬克思是一位有創造力的思想家，是一顆改變世界歷史的「種子」。馬克思提出「唯物史觀」，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動力是社會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兩極分化形成了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其最高形式是進行社會革命，奪取國家政權；社會發展的歷史是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的歷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馬克思企圖顛覆資本主義世界，二十世紀蘇聯、東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化」表明，馬克思這一「種子」是怎樣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沒有馬克思，就沒有俄國「十月革命」；沒有「十月革命」，就沒有毛澤東。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少數人「創造」了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二十世紀兩大陣營的對立，發端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在馬克思時代，歐美資本主義確實存在着「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馬克思把這種「對立」神聖化，美化為改造社會的動力。當馬克思的後代信徒大談「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時候，他們沒有想到，他們從事「創造歷史」——「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的活動，正是《共產黨宣言》希望「無產階級」或「人民群眾」去做的活動。當列寧批判考茨基(Karl Kautsky)、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毛澤東反對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和劉少奇的時候，正是他們對保持馬克思這一「種子」的「基因不變性」的努力。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依靠暴力和國家權力全面改造社會和社會制度的意識形態。毛澤東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馬克思認為建立新社會要靠以工人為主體的無產階級，而毛澤東依靠的是億萬中國農民。毛澤東的革命並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是傳統中國農民革命的現代版。與傳統中國農民革命不同，毛澤東在根本問題上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就是

說毛澤東與馬克思一樣，主張依靠暴力和國家權力全面改造社會和社會制度。毛澤東的土地改革、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化和疾風暴雨的文革，用國家權力全面改造了中國社會。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社會。

### 三 人權保障和社會公正：難於同時實現的目標

在一個國家範圍內創造歷史，涉及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的變革，需要有明確的目標、可行的步驟。經濟的發展必然會逐步改善生活環境、提高生活水平，但不會必然消除專制暴政和兩極分化，所以，對一個政府來說，為造福人民，有兩個比經濟發展更為根本的目標，這是與每一個人直接相關的目標，一是人權保障，二是社會公正。這是兩個永恆的目標。然而，人類歷史表明，人為了維持生存、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這兩個目標很難同時實現。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前的時代，無論是東方世界還是西方世界，政府的目標就是統治人民，都沒有把人權保障和社會公正作為目標。從西方世界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到科學和工業革命時代，人的權利問題愈來愈受到重視。歐美國家政治制度的法制化，使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一步步得到保障，但這些國家發展的自然後果是社會財富出現了兩極分化，社會公正受到了危害。馬克思主義就是對資本主義早期社會兩極分化有所反應的產物。當俄國、東歐、中國、朝鮮和越南遵照馬克思的理念，消除人的財產權，企圖實現經濟平等時，人的種種自由選擇權，事實上就受到了侵害和剝奪。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直接原因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省，這是第一份在全球範圍內表述所有人類都應該享有的權利的文件。在《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後十八年，聯合國通過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十年後，即1976年1月和3月，這兩個公約先後生效，分別致力於社會公正和人權保障兩個根本目標。

這裏要特別說明的是，「人權」有狹義和廣義兩個用法。狹義的人權大體上就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涉及的權利，如生存權、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信仰自由、選舉權、正當的法律程序和公平審訊等；加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規定的權利，如免於飢餓、受教育權、得到社會保障，就是廣義人權。上面提到，國家有兩個根本目標，第一個目標中的「人權保障」，是指狹義人權。

狹義人權事實上是「天賦人權」（下稱「第一類權利」），是人生而具有的。社會經濟文化權利是「人賦人權」（下稱「第二類權利」），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才能充分實現的人權。中國現行憲法第二章對這兩類人權都有所規定，其中第三十四至三十八條的規定主要涉及第一類權利，第二章的其餘條款主要涉及第二類權利，有些條款也與第一類權利有關。這兩類權利有三大區別：

第一，對第一類權利來說，「你不要，它也存在」，而對第二類權利來說，「你想要，它不一定存在」。第一類權利是天賦的，是人生而具備的，即使你不行使這種權利，它本身也是存在的；第二類權利是人賦予人的權利，是人創造的權利，它的實現需要有相應的經濟條件和其他條件。用法律語言來說，第一類權利是「可以立即實施的」，第二類權利是「有條件才能實施的」。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全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第一類權利都可以較快確立起來。至於第二類權利，誠如《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指出，這些權利的充分實現是需要「逐步達到」的。在一些國家和地區，一心追求「政績」的掌權者，在條件不具備時把實行「全民普及大學教育」、「全民醫療健康保險」、「全民良好住房」作為目標，實行一段時間後，總是適得其反，在經濟上造成災難性後果。

第二，第一類權利具有「可審判性」(justiciable)，第二類權利則不具有「可審判性」，在法庭上無法根據有關第二類權利進行審判。

第三，第一類權利的標準，理論上在全世界是相同的；第二類權利因不同國家的不同國情在標準上會有所不同，例如，良好的工作條件、社會保障水平、受教育的水平等。

兩類權利有不同的社會功能，保障第一類權利有助於實現自由民主，保障第二類權利有助於實現社會公正。

## 四 中國共產主義興起的根源

大轉型可以從不同時間尺度觀察，既可以從百年、千年的「長尺度」來觀察，也可以從大轉型關鍵時期的若干年的「短尺度」來分析。從「長尺度」看中國歷史，可以發現兩次大轉型。中國歷史第一次大轉型，經過春秋戰國時期漫長的準備，在秦始皇統一中國時完成，這次轉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的國家。從十九世紀後期清王朝洋務運動起，經過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共產黨革命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大轉型。洋務運動是十九世紀中國的「舊改革開放」，戊戌變法及清末新政是中國的「老憲政運動」，辛亥革命是要把秦始皇以來的傳統專制制度轉變為民主共和制度，把中國改造成為富強文明的中國。一百多年來，憲政、自由、民主、共和思想已經廣為傳播，中國經濟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現在的中國，在四十年改革開放巨大力量的推動下到了關鍵時刻，必將以不可阻擋之勢完成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大轉型。

辛亥革命後，中國本來可以按中華民國的憲法，不斷完善法制，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法治國家，但當面臨議會、政府以及其他爭端時，腦袋中缺乏法治觀念的孫中山，只知道「二次革命」，而腦袋裏只有專制皇權思想的袁世凱，身為中華民國大總統，藉口反對「二次革命」的叛亂，解散了國民黨，摧毀了國會，走上了復辟帝制的道路。孫中山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共

和，是創造歷史；袁世凱摧毀第一共和，也是創造歷史，不過是廣義上創造歷史。

袁世凱復辟帝制，眾叛親離，在宣布取消帝制後兩個多月便逝世。北洋軍閥掌權時，中國傳統的分離主義勢力以軍閥割據面貌抬頭。當時的中國人民在前述兩類人權上都沒有保障。從十九世紀末康梁變法、孫中山提倡共和到大清王朝的滅亡，二十多年中，中國人沿着憲政、自由、民主、共和的道路前進，最後落得一個袁世凱復辟帝制和軍閥專政的下場。正是在中國找不到前進道路時，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思想開始在中國流傳，促成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從此，共產主義就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一支日益發展壯大的力量。

如果說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是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的外部原因，那麼可以說，中國共產主義興起的國內根源，一是締造中華民國的英雄在面對新生的共和國時，腦袋裏不是沒有法治民主，就是追求武力稱霸；二是從洋務運動以來中國早期資本主義發展形成的兩極分化。

兩極分化現象並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但資本主義會使兩極分化加劇，特別是權力和金融擴張不受制約的資本主義。在中國專制王朝時代，權貴對民眾的掠奪、土地和財富的集中使貧苦農民無以為生，這樣就引發一次又一次的農民革命。農民革命勝利的結果，就是新王朝的建立。十九世紀中國最大規模的一次農民革命就是太平天國革命，二十世紀中國最大規模的農民革命就是共產黨革命。與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不同，共產黨的農民革命穿上了從俄國引進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衣裳。

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凡是第一類權利受到嚴重侵犯的國家，自由民主共和的思想就會傳播、反對暴政專制獨裁的運動就會興起。凡是第二類權利被忽視、兩極分化愈來愈嚴重的國家，社會公正的呼聲就會高漲，經濟平均主義、反資本主義的思想就會抬頭。當中國內地的資本主義穿上了社會主義衣裳時，不僅中國內地，而且香港的一些要求社會公正的抗議運動，也穿上了民主衣裳。在馬克思以前，在許多宗教、社會倫理和哲學思想中，早就有平均主義、「均貧富」思想的萌芽。馬克思主義與以前這些思想的不同在於，它針對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引起的兩極分化，主張用暴力來全面改造社會，推翻並消除資本主義，建立所謂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新社會。馬克思主義的關注重點不是國家政治制度，而是要用暴力全面改造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當馬克思主義談到國家制度時，雖然有時提及民主共和，但為了要用暴力改造社會，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都主張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 五 鄧小平的改革和六四後的變化

對一個國家或許多國家來說，不同時期內部均隱含着不同的、不斷增長的社會需求，只是由於各種原因，這些需求受到壓制。在這種情況下，歷史

的創造者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來對待這一問題。一種方式是，歷史的創造者比常人更早發現這些需求，並找到實現這些需求的正確方向和道路，造福於人民大眾。另一種方式是，歷史的創造者把人民當作「追隨者」，為滿足這些需求而把他們引導到錯誤的方向上去。當然，介於這兩種方式之間，還有種種複雜的情況。

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也是創造當代中國歷史的「種子」。但鄧小平與毛澤東不同，他以第一種方式去實現社會需求。經歷過文革災難的鄧小平在掌握大權後，開始小心翼翼地衝破「姓資姓社」意識形態的束縛。毛澤東去世後，中國農民中存在着一種希望擺脫人民公社束縛的強烈需求，正是鄧小平、萬里、胡耀邦、趙紫陽最早意識到這種需求的正當性、合理性，從農村開始，採取了緩進的、逐步的經濟改革，採用種種有助於經濟發展的做法，大量引進外資，鼓勵私人資本主義發展，讓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改革開放解放了被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束縛的社會需求，鼓勵人們發財致富，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

鄧小平的道路是依靠社會本身的力量，使中國一步步地從毛澤東時期的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社會，轉變為一個國有與私人混合的經濟、計劃市場並存的社會。四十年來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經濟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建立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基礎上，黨和政府控制着人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從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由於私人經濟不斷發展，國有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sup>④</sup>，舊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大體消失，在非政治領域，黨和政府的控制大為減弱。

與十八、十九世紀歐美國家以能源革命為標誌的工業化不同，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工業化，不僅是材料、能源的革命，而且是以互聯網為標誌的信息革命。建築業、交通運輸和通訊業的空前發展，使中國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高潮。這是繼清末「舊改革開放」後的「新改革開放」，使中國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中國和毛澤東時期中國的經濟制度。

在政治體制方面，鄧小平也提出並進行了改革。鄧小平看到毛澤東終身掌握最高權力的危害，在文革後提出反對搞「個人崇拜」，主張廢除領導職務的終身制。上世紀80年代的政治改革，鄧小平主要做了兩件大事：一是修改憲法，1982年由全國人大通過了新憲法；二是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按照他的思想制訂的政治改革方案。此外，1986年成立了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sup>⑤</sup>，1987年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討論並原則同意該小組起草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具體改革包括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機構改革、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加強法制建設等方面。

至於1982年憲法，有一點是自1949年以來的重大突破，那就是憲法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這一規定，出於鄧小

平「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主張，也是用憲法肯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政體」國家的最重要表現。

然而，1982年憲法仍然有嚴重缺陷。對一個國家來說，最高國家行政權是集中統一的，不能由兩個機構同時掌握。現在除了伊朗憲法明文規定總統的位置在最高領袖之下，幾乎所有國家，無論是專制國家，還是民主國家，最高國家行政權皆由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掌握。中國根據1982年憲法設立了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由主席、若干副主席、若干委員組成。中央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領導全國武裝力量。該憲法把全國武裝力量的統帥權從國家的最高行政權中分割了出去，無論是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都不一定掌握全國武裝力量的統帥權。不僅如此，當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時，卻沒有規定中央軍委主席連任的限制。憲法的這些規定與伊朗類似，事實上在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之上設立了一個「最高領袖」——中央軍委主席。

1982年憲法通過前，在討論憲法草案時，筆者在北京《光明日報》發表了〈從長遠觀點看憲法〉一文，指出這種規定存在的嚴重問題<sup>⑥</sup>。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這部憲法，並在翌年的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按照這部憲法產生了新的國家領導人，李先念為國家主席，趙紫陽為總理，鄧小平任中央軍委主席。在1988年的第七屆全國人大上，鄧小平連任軍委主席，楊尚昆任國家主席，李鵬任總理。這時趙紫陽已從總理職位上離任，擔任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職務總書記，同時兼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當趙紫陽與鄧小平在戒嚴問題上發生分歧時，終於釀成中國政治的大變局，鄧小平在廢黜趙紫陽的同時，製造了震驚全世界的「六四」災難。

除了政教合一的伊朗，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憲法會如此把武裝力量的統帥權從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權力中分割出去，而這種分割正是造成1989年政治災難的一個制度原因。對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回顧和反思，是不能不正視1982年憲法中的這一問題的。2018年3月，中國將召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其中一個議程是修改憲法。新憲法有必要使國家元首與中央軍委主席職位合一，使國家元首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同時，也有必要保留1982年憲法關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限任制的條款，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共和國」的根本標誌和根本原則。

在創造歷史的最廣泛的意義上，六四事件不僅是中國的大事，而且是二十世紀的世界大事。六四以後，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政治改革方案就被束之高閣，鄧小平在1980年代提倡的「黨政分開」也被完全放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常委，依然像文革前那樣，成了「政府以上的政府」。

六四事件改變了鄧小平原有的「種子」，這顆「種子」的「基因」發生了突變。六四後中國絕大多數人採取了逃避政治的生活方式，金錢至上、聲色犬馬瀰漫社會每個角落。私人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但由於缺乏法治，經濟領域中充斥了權錢交易，貪官污吏遍及全國。在非政治領域，官方放鬆了各



種控制和管制，崇金炫富司空見慣，吸毒賣淫死灰復燃。文革結束後十多年社會寬鬆局面不復存在，政府愈益加強新聞管制和對不同意見的打壓，在「維穩」的藉口下，強化對人民的控制。

如果說，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引進各種資本主義經濟的做法，仍然受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限制，那麼可以說，在六四後由於蘇聯、東歐的大變化，舊有的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在江澤民當政時，中國進入了資本主義大發展的時代。六四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完完全全轉變為一種既新又舊的資本主義，這是一種不同於現代歐美資本主義的中國式資本主義。概括起來，有三大特色：一是權貴資本和金融資本相結合，並處於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民間私人資本有限度地發展增長；二是受控市場經濟，權貴資本有力地控制着整個國民經濟，在各個局部和微觀範圍內，市場經濟發揮着重要作用；三是兩極分化日益加劇，少數權貴和富豪佔有全社會的大部分財富。2014年7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組織完成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顯示，目前中國三成以上的社會財富被頂端1%的家庭所佔有，而底端25%的家庭僅擁有一成社會財富<sup>⑦</sup>。

權貴資本是一種變相的官僚資本，這種資本的部分控制者的權力地位並不鞏固，隨時會因反腐或其他政治原因而失去權力和財富。加上許多權貴資本控制的企業，披着國有經濟的外衣，權貴人物不能像歐美私人企業家那樣取得全部資本收益，因而，中國官方不承認這種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不管如何稱呼當代中國的社會經濟制度，與歐美資本主義相比，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中國兩極分化現象超過了許多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由於權貴資本與國有經濟不可分割，資本主義經濟穿上了社會主義的衣裳。

## 六 兩極分化的歷史類比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今天中國的狀況在歐洲歷史上曾經出現過，最為典型的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法國。經過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暴力革命開啟了恐怖統治時代，掌握權力的革命極端派把溫和派推上了斷頭台，最後，革命極端派也被送上了斷頭台。經過拿破崙和後來的復辟王朝，到十九世紀中期，法國繼英國後也進入了工業革命的時代，隨着新技術的發明和引進，整個社會的目標從追求民主自由轉向了追求金錢財富。就像今天的中國一樣，法國的工業革命伴隨着大規模的城市化。拿破崙的侄子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依靠農民的支持，在全民普選中贏得了絕對多數，當上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總統。幾年後，他發動政變，復辟帝制，從共和國總統變成了法蘭西第二帝國的皇帝，稱為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拿破崙三世統治時期，法國的經濟高速增長，製造業中蒸汽機總馬力數增長了五倍，全國運營的鐵路線超過了17,000公里，法國的鋼鐵產量躍居世界第二<sup>⑧</sup>。這一時期的

法國也是城市化的時期，從1853到1870年的十七年中，巴黎的面積擴大了一倍，人口增加了七十萬，成片高樓拔地而起。當時法國處於資本主義大發展時代，民主自由卻在拿破崙三世的腳下遭到踐踏，社會公正蕩然無存。

日光之下雖然沒有新事，但是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不同於其他國家的歷史。1989年中國的民主運動與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兩者相距整整兩個世紀，國際環境和國內狀態都沒有相同之處，但有一點是可以比較的：1789年前後，法國的思潮發生了根本變化，在拿破崙三世統治前十年，民主共和運動銷聲匿迹，鼓勵社會上的浮華作風成了政策，暴發戶揮金如土、宴樂享受四處可見；1989年前後，中國的社會思潮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們炫富習以為常，維護社會穩定成了反民主的正當理由。當然，歷史前進了二百年，中國在1989年後的變化遠比1789年後法國變化的節律快得多，在很多方面無法進行簡單的比較。

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一方面中國經濟獲得巨大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另一方面中國就像經歷過法國大革命後的拿破崙三世時代一樣，工業革命和大規模的城市化把幾乎所有人都驅趕到追逐金錢財富的行列中去了。正是兩極分化、炫耀財富的社會滋生了馬克思主義，今天中國權貴的窮奢極欲和被驅趕的貧窮勞工生活形成了強烈對比，使無數貧窮勞工仍然把毛澤東看作自己的救星。以改革開放為名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的共產黨，為了安撫中國的貧窮勞工，也有意無意地舉起毛澤東的旗幟。

在一個長期實行專制統治的國家，民主政治的產生有賴於第一類權利——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觀念的普及。就像上文所說，人權保障和社會公正是兩個難於同時實現的目標。在大多數人缺乏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觀念的國家，當兩極分化愈來愈嚴重時，人們有兩大選擇，一是革命造反，二是期盼當權者厲行改革。2012年中共十八大落幕不久，新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主持了一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對「廉政建設和反腐工作」的建議。王岐山向與會者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一書。當時，人們對王岐山推薦這本書的目的眾說紛紜，五年過去，時過境遷，現在可以比較清楚地了解到王岐山推薦這本書背後的想法：他用這種暗示方式提醒人們，法國大革命是官場普遍腐敗和當權者愚蠢自私的報應。中國過去五年的反腐，幾乎顛覆了六四後二十多年形成的、空前龐大的權貴資本集團，在王岐山心目中，反腐是為了在六四後的中國避免一場「大革命」。

## 七 新時代的新英雄與重新認識「資本主義」

在人類歷史中，有兩種明顯不同的作用：一是「原因結果關係」(因果關係)；二是「挑戰應戰關係」(挑應關係)。因果關係在人類歷史上大量存在，無需作出說明。挑應關係是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在《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一書中提出來的。對同一「挑戰」，不同人有不同「應戰」

方法，與「同一原因產生同一結果」的因果關係完全不一樣，挑應關係是無法預測的。湯因比說，「那種朝一個預定目標必然前進的觀念並不適用於人類世界」。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普通人對「挑戰」只會作出普通「反應」，而「具有創造力的少數個人」會作出「創造性反應」。「一個文明的未來命運操在具有創造力的少數個人手中」<sup>⑨</sup>，並非甚麼「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

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一書，正確地指出了「具有創造力的少數個人」面對歷史發展關鍵時刻的「挑戰」時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具有創造力的少數個人」，由於其性格、氣質、視野、思想、應戰能力的不同，就會作出不同程度的「創造性反應」。公元前四世紀，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Philip II)的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er III)生性剛毅，早就懷有建立「大帝國」的思想，亞歷山大繼位後的「東侵」，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空前龐大的帝國。俄羅斯的彼得大帝(Peter I)也是一個具有創造力的人，在他二十五歲時，遊歷西歐一年半，學習航海、造船和西方文化，決心把長期受拜占庭和蒙古這些東方文化影響的俄國，轉變到學習西方文化方向上去。正是彼得大帝個人對西方的了解和改變俄國落後面貌的決心，俄國才開始走上專制政治下軍事經濟西化的道路。毛澤東對西方文化沒有直接感受，他只熟悉中國帝王的統治權術。毛澤東的政治，實質上是中國傳統的「宮廷政治」，他為「皇位繼承」問題處心積慮，為鏟除他不喜歡的「皇位繼承者」而發動文革，不能不說與毛澤東個人的眼界、知識面、性格和氣質密切相關。中國在毛澤東去世後的改革開放，也走專制政治下軍事經濟西化的道路，這與鄧小平年輕時到法國學習和他對西方的了解大有關係。

一種「思想」再好、再正確只能間接創造歷史，歷史的直接創造者是有英雄氣概、英雄魄力、英雄智慧、英雄才能的人。馬克思也是歷史的間接創造者，是二十世紀蘇聯、中國歷史的間接創造者，直接創造者是列寧、毛澤東。要直接創造歷史，必須取得權力或影響力。秦始皇、凱撒大帝、亞歷山大大帝、成吉思汗、拿破崙通過戰爭「創造」大帝國，是他們在掌握權力後按個人意志進行討伐征戰的結果；而路德(Martin Luther)「創造歷史」，締造「宗教改革」，是依靠他在特定時代、特定社會條件下的影響力。

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現實中存在着各種政治力量，歷史的直接創造者必須有能力把最大力量掌握到自己手中，按自己的想法去行動。歷史上有許多時期，民眾中長期存在一種強烈的社會要求，所謂「逆歷史潮流而動」，就是對抗這種社會要求；歷史的直接創造者必須順應歷史潮流。歷史上也有許多時期，民眾中的社會要求十分分散，歷史的直接創造者要有凝聚各種力量的雄才大略。

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古老的中國正在轉變為一個各個方面現代化的中國。這個大變革、大分化、大轉型的時代，是一個群星燦爛、英雄輩出的時代。每一個領域都有這一領域的英雄，整個中國有屬於整個中國的英雄。就像歷史上出現了不少超越了國界、民族，屬於全人類的英雄一樣，二十一世紀是全世界的「新軸心時代」，中國大地上也會出現全人類的英雄。

英雄的首要特徵是有遠見卓識，能夠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東西，在相同中識別不同，在不同中看到相同，在變化中發現不變，在不變中察覺變化。在人類社會中，只有政治可以在短時間內發生劇變。可以說，政治幾年一變，經濟幾十年一變，文化幾百年一變，文明以千年為單位發生變化。人類的各個文明不是人民群眾創造的。釋迦牟尼、孔老夫子、耶穌、穆罕默德創造的文明，屹立千年，他們都是締造不同文明的屬於全人類的英雄。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科學技術。在牛頓、瓦特之後，二十世紀以來又湧現出許多信息科學技術方面的燦爛明星，他們也是我們時代的英雄。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面臨的老問題仍然是：「中國向何處去？」在全世界範圍內，1848年後興起的馬克思主義，在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的那一天，就開始退出世界歷史舞台了。在歐、美、日、澳等發達國家，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主義早已不同於馬克思時代的「老資本主義」，這些國家用股份制使私人企業「社會化」，造就了強大的中產階級，建立了社會福利制度，而馬克思時代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已轉變成企業股東與企業經理人之間的矛盾。現代西方的資本主義已經不能用馬克思的學說來說明了，相反，為揭露中國今日資本主義的弊端，卻可以在馬克思的學說中找到充分的根據。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導致了十九世紀馬克思主義興起時的老問題，而且，二十一世紀中國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金融在全球的擴張，金融資本催生了中國內部和國家之間財富轉移的新問題。

《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都沒有用過「資本主義」這一術語。但列寧用「資本主義」一詞時，「資本主義」成了一個壞的稱呼，成了革命者要推翻的一種制度。歷經二十世紀蘇聯、東歐和中國「反資本主義」和實行「共產主義」（或公有制經濟）的大變革，現在到了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時候了。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將明顯暴露出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的錯誤。事實上，資金本身不等於資本，當資金被用來產生新財富、產生利潤時，資金才成了資本。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利潤是用來回饋資本所做出的貢獻，而不是只用來支付材料成本和勞動貢獻的。對於私人資本，為了追求最大利潤，就必然把資本投向最急需的地方。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國家的絕大部分資本歸私人所有，但資本主義國家仍然可以有國有企業，國企的首要目標不是為了贏利，而是為全社會的公共利益服務；國企的高管不是大老闆，而是按法律任命的文官。毛澤東摧毀了私人資本，而今日中國的國有企業高管，都把自己看作追求個人私利的大老闆，而「唱紅打黑」，把反對權貴資本主義和摧毀私人資本結合在一起了。

資本主義有良好的資本主義和壞的資本主義之分。良好的資本主義有四大要素：一是政治和經濟的分離，任何人無需政府特許，只要辦理註冊登記就可以創辦工商實體企業，企業有充分的自主權；二是財產權的保障，包括嚴禁用政府權力和金融權力掠奪私人財富的行為，財產權的保障還要有一整套有效的法律體系和解決財產爭端的法律體系；三是市場經濟和與市場經濟相配合的信用制度，人人承擔遵守承諾、合同的義務和責任；四是政府用經

濟的辦法管理經濟並用經濟辦法保障社會公正。中國今日的資本主義，在金融與世界接軌的名義下，權貴資本和金融資本密切結合，使這種資本主義充斥權力掠奪、金融掠奪，不講信用，不守承諾。權貴的財產得到保障，而普通企業家和個人財產卻經常受到權力和金融欺詐的掠奪。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由於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信息革命，使人類社會正在走向一個全新的時代，因此要思考和預測未來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時代的資本主義如何分配資本和勞動的收益。由於經濟活動中消費環節不能由機器人進行，而只有人類本身才能從事，到高度智能化和高度機器人時代，「設計創造」和「消費享受」將成為全人類兩個最偉大的經濟目標，社會也隨之按「人生目標」分化為三大階級——創造階級、享樂階級和管理階級。現在的中國還離未來這個時代很遠，到那個時代，人們會覺得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古老的學說。然而，當我們看到二十一世紀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時代的遠景時，可以知道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不可能走向新時代的。

面對新時代和中國的第二次大轉型，中國需要有英雄的遠見和洞察力、英雄的氣概和英雄的獻身精神。英雄之所以能夠創造歷史，是因為只有英雄才能意識到一個社會中民眾的普遍需求，而願意奮不顧身實現社會變革。

## 八 實現和平民主的大轉型

近四十年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大發展的時期，但兩極分化也愈來愈嚴重。太平天國產生的根源是清王朝的專制政治和兩極分化，共產黨的壯大是國民黨專制政治和兩極分化的結果。今天，中國毛澤東熱的根源來自於六四後愈來愈嚴重的兩極分化。可以說，十九大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改變六四後愈來愈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

改變兩極分化，有政治、經濟兩種途徑：一種是政府依靠國家權力的政治強制，是狹義的政治途徑，戰爭和革命則是廣義的政治途徑；另一種是政府用經濟的辦法管理經濟並實施保障社會公正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稅收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推行個人崇拜，依靠毛澤東熱，倡導無產階級（窮人）專政，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強制的途徑。近一個世紀以來，所有發達國家都早就把「社會公正」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社會公正不是經濟平等，而是既保障私人財產所有權、承認財產差別，又通過政府政策調節收入差距，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一系列制度。當今中國不能正視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為緩解現在日趨嚴重的兩極分化，就把這種做法稱之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今天中國受意識形態束縛，就只能在資本主義的身上穿上有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衣裳。卡萊爾寫《衣裳哲學》（*Sartor Resartus*）時，肯定沒有預見到「社會主義」也會成為「衣裳」。

民主政治和社會公正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迴避的兩大問題。民主政治是權力來源與人民的政治，在民主政治下，政府權力受到憲法和法律的限制，

人民權利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障。「法治」是「法的統治」，就是執政黨、政府的權力也要受到憲法和法律的限制。中央與地方權力有明確劃分，立法、司法、行政權之間有分權制衡，主要政務官由政府首腦提名，由議會批准，文官沒有任期，按法律任命，只有政務官與國家行政首腦共進退，保障了最高國家權力的同步更迭。最高行政權是集中的，不容存在胡錦濤時代的「多頭政治」。現代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雖然都包含這些因素，但一些國家由於金融資本的過度擴張，少數金融家獲取了與他們努力極不相稱的巨額財富，使整個社會中「工作和回報之間的關係」愈來愈不相關，由選舉產生的政府對此無能為力，加上議會中存在「過度制衡」的「否決權主義」(vetocracy)，這些事態的發展正在損害着當代的民主政治。

從若干年的「短尺度」觀察，今天的中國正處在大轉型關鍵時期。大轉型的關鍵就是為建立民主政治和社會公正創造條件，關鍵性的第一步要像當年胡耀邦那樣在重大問題上恢復正義、平反冤假錯案，尤其是恢復六四真相。大轉型的關鍵是在全國每一個地方真正確立法治原則，把國家憲法放在政黨、利益集團、個人之上。憲法可以按憲法規定的程序修改，但憲法的權威高於一切。沒有法治，市場經濟不能有效運轉，人民的權利沒有保障。

中國幾千年歷史存在兩大循環，一是秦漢隋唐宋元明清的「王朝循環」，二是「分合循環」，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南宋金夏是中國分裂時期，袁世凱死後的民國時期，軍閥割據、國民黨政權、汪偽政權、「滿洲國」傀儡政權、共產黨「解放區」的並存，是古老中國分裂割據的現代版。毛澤東統一了中國大陸，至今仍未結束台海兩岸的敵對分裂狀態。

中國第二次大轉型，就是要最終結束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循環和分合循環。在交通運輸和信息通訊高度發達的今天，中國的大轉型只能走和平的道路，就是革命性的大變革，也是「和平革命」。台海兩岸的統一，只能和平統一。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交通運輸和互聯網把全球連成一個整體，軍事力量仍然可以作為一種威懾，但任何用暴力和武力形成的改變，只能給人民帶來災難，都不能持久，也得不到絕大多數國家和全球輿論的承認。無論是一國，還是全球，二十一世紀的大轉型只能通過和平的、非暴力的道路實現。

和平轉型過程本身也是民主化的過程，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必將使兩岸和平統一提上議事日程。在國家結構問題上，未來的中國最有可能的是成為統一的、聯邦制的共和國。交通運輸的發展，人口的流動，地區間愈來愈緊密的經濟文化聯繫使中國難於分裂，從地緣政治來看，蒙古會回歸中國，西藏、新疆沒有獨立可能。民主政治將打斷王朝循環，聯邦制將結束分合循環，中國有幾千年歷史的兩大循環就此消失。

兩岸和平統一，需要兩岸共同召開制憲會議，制訂中國的新憲法。這部新憲法可以稱為「第三共和憲法」。唐宋元明清是專制王朝，辛亥革命開始了中國共和時代，中華民國是中國的「第一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第二共和」，儘管毛澤東和其後的中國政治充滿專制色彩，但還是與大清王朝「一家一姓」的皇位繼承有所不同。1949年後的中國，把「家天下」變為「黨天下」，

既可以稱為「紅色王朝」，也可以勉強地歸入「第二共和」。兩岸統一後的中國，以制憲會議通過「第三共和憲法」為標誌，將進入中國歷史的「第三共和」時期。第三共和國就是「中華共和國」，或簡稱「中國」。政治世界沒有烏托邦，就是「第三共和」時代，還會帶有不少舊時代政治的殘餘。

中國的「第三共和」就是可見的新時代。中國一定要有民主、有法治。民主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但沒有民主法治，中國永遠走不出「治亂分合」的兩大循環。有了民主和法治，殘酷的「宮廷政治」才會消失，人民的權利才能得到可靠保障，市場經濟才能有效運轉。政治上的問題不會在大變革、大轉型後完結，有政治就會有矛盾、有分歧、有傾軋，然而，作為中國最大的政治，依然是要站立在一切矛盾、分歧之上，始終不渝地為保障人權和社會公正不懈努力，這是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制度基礎和根本保證。

### 註釋

① 《自私的基因》中文版把“Memes”譯成「擬子」。參見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著，盧允中、張岱雲、王兵譯：《自私的基因》(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頁243。2003年，《基因、創世紀和上帝》一書中，“Memes”第一次被譯為「心因」。參見羅爾斯頓(Holmes Rolston)著，范岱年、陳養惠譯：《基因、創世紀和上帝：價值及其在自然史和人類史中的起源》(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

② 卡萊爾(Thomas Carlyle)著，何欣譯：《英雄與英雄崇拜》(台北：國立編譯館，1963)，頁1。

③ 規範世界是不同於物質世界、觀念世界的第三個世界。參見嚴家祺：《普遍進化論：分子進化·生物進化·社會進化·精神進化的統一理論》(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頁239、362。

④ 到2013年，國有企業佔全國總資產的17%。而民營私人企業，在每年新增GDP中的份額愈來愈大，僅在工業領域，2015年為93.1%，2016年為90.4%；如果考慮到服務業，這個比重更大。參見李楊主編：《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⑤ 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由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五人組成，辦公室由鮑彤、嚴家祺、賀光輝(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周杰(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負責。參見吳國光：《趙紫陽和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頁22。

⑥ 嚴家祺：〈從長遠觀點看憲法〉，《光明日報》，1982年5月5日，第1版。

⑦ 〈《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發布：財富不平會自我強化〉(2014年7月25日)，中國經濟網，[http://cen.ce.cn/more/201407/25/t20140725\\_3232048.shtml](http://cen.ce.cn/more/201407/25/t20140725_3232048.shtml)。

⑧ 伯里(J. P. T. Bury)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組譯：《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十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第十七章。

⑨ 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著，劉北成、郭小林譯：《歷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111。

**嚴家祺**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1986至1987年曾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現居美國。